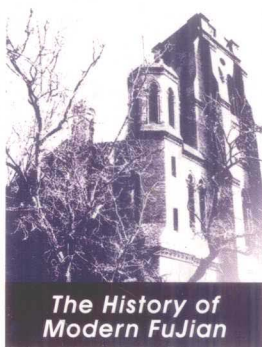


近代福建社会史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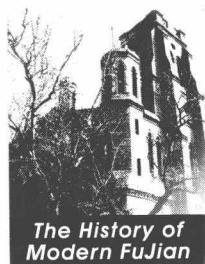
杨齐福 著

《近代福建社会史论》着重探讨基督教会近代福建社会发展的历史作用及近代福建社会之变迁，如近代福建私塾的改良、近代福建鼠疫的防治、民国时期福建社会救济、民国时期惠安女之集体自杀、1948年福州水灾等，揭示近代福建社会变化之特点，进而探寻近代福建社会变迁之规律。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近代福建社会史论



杨齐福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福建社会史论 / 杨齐福著. —北京: 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 2011. 12

ISBN 978 - 7 - 5097 - 2739 - 3

I. ①近… II. ①杨… III. ①社会史 - 福建省 - 近代
IV. ①K29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92067 号

近代福建社会史论

著 者 / 杨齐福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人文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215

责任编辑 / 刘 丹

电子信箱 / renwen@ssap.cn

责任校对 / 刘伟雷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责任印制 / 岳 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19.5

版 次 /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字 数 / 316 千字

印 次 /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2739 - 3

定 价 / 7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言

汪 征 鲁

福建之所以为福建，一方面具有大中国的一般通性；另一方面又具有自身的特点。其特点最显著者在于，八闽地处中国大陆东南，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具有山海形胜。其所负之山，不仅有中部的鹫峰山脉、戴云山脉及西部边缘的武夷山脉，而且还背负着中国内地广袤的高原与崇山峻岭。其所临之海，有曲折海岸线与众多岛屿的台湾海峡，越过台湾便是烟波浩渺、横无际涯的太平洋。这样的地理环境无疑会赋予在此滋生与演化的经济、文化，既可能是海洋的性质，又可能是大陆的性质。这个背负中国内陆的山海形胜的地理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闽文化发展演化的三个阶段或依次而出现的三种趋势，即作为闽文化初始的以福建新石器时代之昙石山文化为代表的海洋文化或海洋性文化的发展趋势；作为中世纪福建以儒家文化之核心价值体系之闽学为代表的大陆文化或大陆文化的发展趋势；晚清以严复之侯官新学为代表的中西文化之交融或中西文化交融的发展趋势。

本书正是以第三个阶段或第三个发展趋势作为社会历史背景来展现这一时期福建社会历史的某些层面。如果说第一阶段是海洋文化或亚海洋文化，表现为海的力量；第二阶段为内陆文化，表现为山的力量；那么，第三阶段是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之交融，是中国社会与文化的现代化过程，则表现为山与海之交融。17、18 世纪，欧洲大陆与美洲大陆相继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于是，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在西方崛起。这一性质的文明又与殖民主义与海上贸易结合在一起，企图席卷全球。18 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势力跨海而来，它们企图用贸易、鸦片、基督教、资本主义的价值观，打开古老帝国的大门。鸦片战争后，中国大门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腐朽的清王朝在西方资本主义势力面前望风披靡，中国被列强瓜分，中

华民族面临着沦亡。于是，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学习西方以自强。与此同时，西学也随着大海东渐。西学与中学的最初碰撞产生了新学。新学的传播与实践以及后来的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由传统农业文明向近代工业文明转型的历史进程。《近代福建社会史论》正是关注这一社会历史背景，并聚焦基督教在闽的活动、社会保障等方面，进而考察近代福建社会的转型。

20 世纪，社会科学经历了两次大的理论与方法的转型。一次是语言学的转型，注重从文献的角度研究人文社会科学；当前又出现了人类学的转型，出现了历史人类学、社会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文学人类学，等等，其特点就是重在展现文化、历史或事象的地域性、个性、具体性，在注重文本的同时，也注重田野调查。而本书颇得第二次转型之学术旨趣。《近代福建社会史论》一书具体研究与展现了近代福建的教会、鼠疫、水灾、女性自杀、社会保障、教授群体等内容，采用了社会学理论与人类学的方法展开研究，通过考察国家与地方的多方互动，试图揭示近代福建社会变迁的多层次性与复杂性。

当然，由于是“散论”性的，为体裁所限，于这一时期福建社会演化的系统性与规律性的阐述尚有不足。这有待于作者今后进一步完善。

杨齐福君虽尚未届不惑之年，于学问已多有创见，尤其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商品社会里，杨君安贫乐道，孜孜于中华传统文化，深得个中三昧。这使我不禁想起《论语·雍也》篇中的一则：“子曰：‘贤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目 录

CONTENTS

上 篇

第一章 近代福建的基督教会	3
第一节 近代福建基督教会的发展过程	4
第二节 近代福建基督教会的发展特点	14
第二章 基督教会与近代福建教育	21
第一节 福建传统教育的衰落	21
第二节 福建教会教育的发端	24
第三节 近代福建教会学校的发展历程	29
第四节 近代福建教会学校的办学体系	34
第五节 近代福建教会学校的社会影响	50
第三章 基督教会与近代福建出版业	56
第一节 1860 年前传教士在福建的出版活动	56
第二节 教会在闽创设出版机构	60
第三节 教会在闽创办近代报刊	66
第四节 福建协和大学的出版活动	71
第四章 基督教会与近代福建医疗卫生事业	79
第一节 近代福建教会医疗事业的发展	79
第二节 近代福建教会医疗事业的兴盛	87

第三节	教会与近代福建医学教育事业的兴起	97
第四节	教会与近代福建卫生防疫事业的开展	104
第五节	教会与近代福建民众医疗观念的转变	110
第五章	基督教会与近代福建社会改良	118
第一节	教会与近代福建社会天足运动	118
第二节	教会与近代福建社会禁烟运动	123
第三节	教会与近代福建社会女性解放	128
第四节	教会与近代福建社会陋习之批判	135
第五节	教会与近代福建社会改良思想之阐释	138

下 篇

第六章	近代福建私塾之改良	145
第一节	近代教育的转型与私塾的衰落	145
第二节	清末民初福建私塾改良	148
第三节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福建私塾改良	153
第四节	南京国民政府后期福建私塾改良	159
第七章	近代福建社会鼠疫防治	162
第一节	近代福建鼠疫之概况	162
第二节	近代福建鼠疫的传播途径与原因	170
第三节	近代福建鼠疫的社会影响	176
第四节	近代福建社会各界应对鼠疫的措施	181
第八章	民国时期福建的社会救济	196
第一节	近代福建社会救济的转型	196
第二节	民国时期福建社会救济的制度化	200

第三节	民国时期福建社会救济的地方化·····	211
第四节	民国时期福建社会救济的民间化·····	226
第九章	民国时期福建惠安女集体自杀·····	234
第一节	民国时期福建惠安女集体自杀之社会现象·····	234
第二节	民国时期福建惠安女集体自杀的社会干预·····	236
第三节	民国时期福建惠安女集体自杀的社会诠释·····	238
第十章	民国时期福建水灾·····	248
第一节	民国时期福建水灾的概况·····	248
第二节	民国时期福建水灾的影响·····	255
第三节	地方政府与民国时期福建水灾·····	258
第四节	民间组织与民国时期福建水灾·····	263
第十一章	福建协和大学教授概貌·····	271
第一节	福建协和大学教授的教育背景·····	272
第二节	福建协和大学教授的流动情况·····	278
第三节	福建协和大学教授的社会角色·····	286
参考书目 ·····		296
后 记 ·····		303

· 上 篇 ·



第一章 近代福建的基督教会

1842年鸦片战争的炮声刚刚沉寂下来，外国传教士就趁着弥漫的硝烟蜂拥而入，他们欢呼“一个崭新的时代现在已经来临”，高喊“我们已经沉默到今天，现在是可以到中国城市的大街上，提高我们的嗓门大喊大叫的日子了”。^① 传教士雅裨理（David Abeel）高唱鸦片战争是“上帝用来打开中国大门的手段”，因而“必须派遣传教士到中华帝国，进入每一个可以进得去的地方，包括中国沿海每一个可以通商的市场。海岸必须侵入，海港必须进去”。^② 另一位传教士倪维思（John Livingston Nevius）直率地指出：“不管这场战争正当不正当，它是按照上帝的意志被用来开辟我们同这个巨大的帝国的新纪元的。”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则认为鸦片战争后“一场伟大的革命已经开始……全能之手明显地导演着这场运动，上帝的旨意将获得推行，而不再受到阻挠”。^③ 这是由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为传教士在华活动作好了必要的铺垫。虽然中英《南京条约》对传教一事只字不提，但中法《黄埔条约》规定法国人可在通商口岸建造教堂，“倘有中国人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④ 《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则更进一步明确了传教士在华的权益，如中法《天津条约》规定，凡“备有盖印执照安然入内地传教之人，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凡中国人原信崇天主教而循规蹈矩者，毫无查禁，皆免惩治。向

① 转引陈文平《福建宗教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第403页。

② 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第122页。

③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第122～123页。

④ 梁为梅、郑则名主编《中国近代不平等条约选编与介绍》，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第44页。

来所有或写、或刻奉禁天主教各明文，无论何处，概行宽免。”^① 这使西方传教士异常兴奋，认为“上帝与这般人民打交道的路总算打开了”，这是“传教史上划时代的新标志”。^② 传教士杨格非（Griffith John）说：“这个国家事实上已经落入我们的手中，一切早已在中国的传教士和各自国内的差会，如果他们不去占领这块土地，不在十八个省的每一个中心取得永久立足的地方，那将是有罪的。”^③ 在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下，传教士纷纷登陆中国，通过直接传教（布道讲经）和间接传教（教育、医学、出版活动）的方式，企图征服“异教”国家。

第一节 近代福建基督教会的发展过程

福建地处东南沿海，是外国传教势力渗透较早的地区。早在 1642 年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Julio Aleni）应叶相高之邀来到福建，开始了其长达 25 年之久的传教生涯。在他的劝化下，福建每年有八九百人受洗，信徒达万余人。^④ 此后，多明我会、方济各会和巴黎外方传教会也进入福建进行传教。鸦片战争后，福州、厦门作为通商口岸，成了基督教登陆中国的桥头堡，各差会以福州、厦门为中心积极向福建其他地区扩展。以厦门为据点的差会主要有归正会、伦敦会、长老会等；以福州为据点的差会则有美部会、美以美会、圣公会等。此外，浸信会、基督徒聚会处、真耶稣教会等差会也在福建传播。

（一）厦门地区教会

厦门开埠之后，西方传教士乘机而入。1842 年 2 月美国归正会（The Reformed Church in America）^⑤ 传教士雅裨理（David Abeel）和美国圣公会

① 梁为棋、郑则名主编《中国近代不平等条约选编与介绍》，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第 98 页。

② 转引杨天宏《基督教与民国知识分子》，人民出版社，2005，第 4 页。

③ 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第 179 页。

④ 林金水主编《福建对外文化交流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第 209 页。

⑤ 归正会是一个移居美国的荷兰侨民教会，以加尔文宗教思想为依据，强调因信称义和圣经权威至上。

(Episcopal Chu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传教士文惠廉 (William Jones Boone) 来到厦门, 从而揭开了近代福建基督教会传教的序幕。

雅裨理初抵厦门, 手持侵华英军全权代表璞鼎查 (Henry Pottinger) 的介绍信前往鼓浪屿, 在驻当地英军的支持下租到了房子, 但其所住的房子“既没有门, 没有窗户, 也没有一间房的地板是完好的”。^① 尽管如此, 他时常“在住宅或露天演讲, 又经常往禾山、同安等处布道”。^② 1842 年 6 月美国传教医生甘明 (W. H. Cumming) 抵达厦门, 在雅裨理所腾出一间房子内设立诊所, 借施医赠药以传播福音, 收到了一定的效果。雅裨理在报告中称, 星期天来听布道者近 50 人, 其中有一些是每次都来的, 还有一些是甘明的病人。^③ 尽管当时听讲者和看病者众多, 但信教者极少。1844 年 1 月雅裨理和甘明在厦门城内寮仔后租到两间房子, 一间开设诊所, 另一间传教布道。一年后, 他们又在附近租了一间房子用做医院, 收治需要进行手术和特别护理的病人。雅裨理在写给总会的信中说: “诊所带来的让人高兴的影响是……我们 (指雅裨理和甘明) 赢得了感激, 获得了信任, 人们像对待朋友一样尊敬我们, 并准备心灵的救治。”^④ 1844 年 6 月传教士罗啻夫妇 (Elihu. Doty) 和波罗满夫妇 (W. J. Pohlman) 来到厦门并在卖鸡巷租用民房设立礼拜堂。1846 年 4 月波罗满为 71 岁的王福桂和 68 岁的刘殷舍洗礼, 这是归正教会的首批教徒。1847 年 8 月传教士打马字 (John. Van. Nest. Talmage) 也来到厦门, 壮大了传教队伍。由于卖鸡巷礼拜堂简陋狭小, 1848 年波罗满利用从美国募到的 3000 美元捐款购买了信徒王福桂在新街的房屋和土地, 并在此建造了“上主真神堂”, 也称为“中华第一圣堂”。1850 年打马字在竹树脚设礼拜堂, 后花费 1300 美金在此建造“竹树堂”。^⑤ 尽管传教士努力布道, 但归正会在厦门传教之初收效不大。波罗满曾在报告中写道: “数百名的村民来观看我们, 接受我们的书, 他们还在听到一个外国人讲中国话

① 《雅裨理牧师莅厦第一封家书》,《闽南圣会报》(续刊)第1期,1944,第6页。

② 吴炳耀:《百年来的闽南基督教会》,《厦门文史资料》(第13辑),第78页。

③ Gerald Francis De Jong, *The Reformed Church in China (1842 - 1951)*,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2, p. 15.

④ Gerald Francis De Jong, *The Reformed Church in China (1842 - 1951)*,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2, p. 16.

⑤ Gerald Francis De Jong, *The Reformed Church in China (1842 - 1951)*,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2, pp. 25 - 27.

时发出尖叫。这仅仅都是出于好奇心。总之，除了可笑之外，我们没有给他们留下任何印象。”^① 1849年归正会仅吸收信徒3人、1850年为5人、1851年为8人、1852年为2人、1853年为6人、1854年为42人、1855年为37人。^② 随着受洗信徒的增多，归正会逐渐发展成为厦门基督教第一大差会。1900年归正会在厦门有西方传教士22人，其中男性6人、女性16人；1922年有西方传教士51人，其中男性20人、女性31人；1936年有西方传教士36人，其中男性13人、女性23人。1900年归正会在厦门有本地牧师11人，本地助手30人；1932年有本地牧师13人，本地助手252人；1937年有本地牧师19人，本地助手281人。^③ 后来，归正会沿着九龙江水系向漳州拓展，构建“九龙江福音路线”，第一条路线以龙海石码会堂为基地，沿九龙江西溪发展，陆续建立漳州会堂、天宝会堂、龙山会堂，进入南靖建立山城会堂；第二条路线以平和塘溪（小溪）会堂为基地沿九龙江南溪发展，相继建立坂仔会堂、南胜会堂、五寨会堂等。^④

1844年7月英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派传教士施约翰（Jonn Stronach）夫妇来厦门传教。^⑤ 1846年养为霖（Young Willam）、施约翰的胞兄施阿慄（Alexander Stronach）也来厦门传教。因此，“厦门伦敦会之创业，施家兄弟筚路蓝缕之力也”。1853年施约翰等人在祖婆庙九龙崎脚租房布道，后在卖鸡巷修建了泰山堂。尽管伦敦会传教士在厦门宣教多年，但当地人侧着头用怀疑的目光问道：“你们到底来这里干吗？”施约翰答曰：“我们来，为的是要劝人虔事上帝以邀天福。”1856年吴涂与吴平安父子受洗成为伦敦会在厦门的首批教徒。施约翰在写给伦敦会总部的报告中说：“吴涂丢掉了他的偶像，专心守主日；受洗以后，更加努力追求圣洁与和

① Gerald Francis De Jong, *The Reformed Church in China (1842 - 1951)*,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2, p. 52.

② 许声炎：《闽南长老会历史》，《中华基督教历史》甲编，《神学志》第10卷第3号，1924，第100页。

③ Gerald Francis De Jong, *The Reformed Church in China (1842 - 1951)*,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2, pp. 166 - 171.

④ 姜嘉荣：《清季闽南基督教会之研究（1842~1892）》，香港浸会大学1999年硕士学位论文文，第56~57页。

⑤ 伦敦会是英国自由教派教会所联合组成的海外宣教机构，初名传道会，其宗旨“在异教徒和他其蒙昧民族中传播基督的知识”。

平，奉献他自己给救世主，作他忠实的门徒。他的儿子也是给我们很满意，一个谦卑、热心跟随基督的信徒。”^①后来，伦敦会又吸纳了一位名叫陈束带的海军下级军官，他被信徒称之为“东方的罗约拉”。随着信徒人数的增加，1862年伦敦会又在关隘内街新建一座教堂。截至1876年，伦敦会在厦门的信徒共有1482人，其中男性有972人、女性有324人、小孩有186人。^②后来，伦敦会在厦门周边之海沧、同安、金门、鼓浪屿等设立堂会并向泉州、漳州、龙岩、汀州等地扩展。

1850年5月英长老会（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派遣用雅各医生（James H. Young）来厦传教。翌年7月传教士宾为霖（William C. Bures）也来到厦门。1852年仁信（James Johnston）抵达厦门。1855年杜嘉德（Carstairs Douglass）、1856年山大辟（David Sandeman）、1860年宣为霖（William Swanson）、1864年倪为霖（William MacGregor）相继赴厦协同传教。用雅各、宾为霖等人原先在香港和广东传教，后来到厦门传教是因为“‘闽南人’与‘广州人’具有极大分别。闽南人虽对圣经真理没有多大兴趣，然仍以冷静的态度聆听福音，以友善的态度对待我们。闽南人用心听道，遇上疑问，必定会主动要求传教士澄清，直至完全明白为止”。^③但这一切于传教事业无补。1853年12月宾为霖在信中说，“我在中国辛苦了7年，还未领一个灵魂到基督的面前”。^④无奈之下，宾为霖赴漳州传教布道。1853年宾为霖在漳州白水营建立首个布道站，不久就设立堂会，后因宾为霖回国而将其转交归正会。1855年宾为霖离开后，杜嘉德接任。为了避免与归正会传教事务的重合，他另辟蹊径，到安海、泉州等地传教。美长老会（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也曾派合文（James Curits Hepburn）、娄礼华（W. M. Lowrie）、卢一（John Llord）等人来厦门传教，但因经费与人手的缺乏不久就退出厦门。

19世纪末20世纪初，厦门地区教会发展迅速。据厦门海关报告，1891

① 潘镜高：《伦敦会入闽百年之回顾》，《闽南圣会报》（续刊）第1期，第5页。

② 转引张宇《近代厦门基督教会研究》，福建师范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5页。

③ 姜嘉荣：《清季闽南基督教会之研究（1842～1892）》，香港浸会大学1999年硕士学位论文，第44页。

④ 转引吴文南《传教士宾为霖〈天路历程〉之研究》，福建师范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第44页。

年底厦门地区教会有传教士 47 人,教堂和布道堂 127 处,教友 3504 人。^①而 1901 年底厦门地区教会有传教士 59 人,礼拜堂等 221 处,教友 5623 人,信徒等 4631 人。^②

(二) 福州地区教会

福州既是福建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又是东南沿海地区重要的港口。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福州成为传教士心目中理想的传教点,西方传教士纷至沓来。究其原因,“首先,福州在鸦片战争后人口约 25 万人,在五个通商口岸中名列第二,众多的人口对传教士有很大的吸引力;其次,福州自古以来是福建省的政治中心,其政治影响较大;最后,福州是当时茶叶贸易中心,1856 年由福州运往国外的茶叶达 40972600 磅,比广州同年出口的茶叶高出 34.8%”。^③

1843 年在厦门传教的雅裨理曾打算在福州建立一个传教站,后因力不从心而作罢。1846 年罗啻写信给美部会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④,认为“福州作为省城,其政治文化影响大,极具商业贸易潜力,而且人口众多,气候也很好”,提议尽快向福州派遣传教士。^⑤1847 年 1 月美部会传教士杨顺 (Stephen Johnson) 乘鸦片船抵达福州,并与当时驻榕的英国领事若逊 (R. B. Jackson) 取得联系,试图在城内寻找寓所未果,只得租住在中洲岛。后来,弼来满夫妇 (Lyman Birt Peet)、摩怜夫妇 (Caleb Cook Baldwin)、简明夫妇 (Seneca Cummings)、夏查理夫妇 (Charles Hartwell)、卢公明夫妇 (Justus Doolittle)、吴思明夫妇 (Simeon Foster Woodin) 和历浹 (William L. Richards) 相继来到福州。因保守势力的阻挠,美部会传教士来榕后无法在城内立足,因此其最初的活动范围主要局限在中洲岛一带。他们之所以选择停留在中洲岛是因为这里人口密集,

① 厦门市志编纂委员会编《近代厦门社会经济概况》,鹭江出版社,1990,第 293 页。

② 厦门市志编纂委员会编《近代厦门社会经济概况》,鹭江出版社,1990,第 337 页。

③ 陈林:《近代福建基督教图书出版考略》,海洋出版社,2006,第 52 页。

④ 美部会是以美国公理宗为主体的海外布道机构,清教色彩浓厚。

⑤ 转引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第 193 页。

老百姓对外国人较为友好，而且又处于福州通往闽南的交通要道上。^① 美部会原先计划在中洲岛修建一所两层楼的西洋房子，既当寓所又作教堂，借此吸引众人的目光，趁机扩大教会的影响。摩怜在致美部会秘书 Rufus Anderson 的信中说：“中洲岛从闽江的南岸延伸出来，其长度距离有两到三英里……这附近有大量的人口，将会很快成为我们所希望建立基督教堂的场所。”^② 后来美部会在南台的保福山买到了一块私人墓地，并在此建造了两座洋房和一座教堂。1861 年传教士夏查理和吴思明以 1345 美元购买了于山脚下太平街等处房产，并在此基础上修建了两座洋房。这样，美部会终于在福州城内站住了脚。此后，美部会向福州周边地区拓展，建立了马尾、长乐、永泰等传教中心。美部会在福州传教“头十年中只有一个当地人受洗，接下来的五年中有二十二人吸纳进了教会，再后来的两年中又有二十三人接受了洗礼”。^③

美以美会（American 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早就计划向中国派遣传教士。^④ 1835 年 4 月康涅狄格州韦斯利安（Wesleyan）大学的卫斯理宗信徒提出成立布道团到中国传教的建议，并为此募集 1450 美元作为设立差会之费用。考虑到福州作为通商口岸将成为一个大市场，1846 年 5 月美以美会决定派两名传教士到福州设立差会。1847 年 9 月怀德（Moses C. White）和柯林（Judson Dwight Collins）乘“赫伯尔”（Hober）号邮船到达福州。1848 年 4 月喜谷（Henry Hickok）和麦利和（Robert S. Maclay）也抵达福州。1852 年高礼（James Colder）与怀礼（Isaac Wm Wiley）同来福州，1855 年万为（Erastus Wentworth）和基顺（Otis Gibson）联袂而至，1859 年保灵（Stephen Livingston Baldwin）、娟标礼（Beulah Woolston）、娟西利（Sallie H. Woolston）一起来福州，大大充实了传教队伍。美以美会在福州传教之初并不顺利，传教士在城内找不到住所，被迫栖身于闽江南岸仓山一个名为镜山麓的地方。经过多方努力，1856 年美以美会在茶亭修建了真神堂，“以闽人祀偶之风甚盛，为之辨真假也”，尔后又在仓山修建了天安堂，

① 林金水等编《福建对外文化交流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第 391 页。

② 转引吴巍巍《西方传教士视野中晚清福建社会研究》，福建师范大学 2009 年博士学位论文，第 29 页。

③ 卢公明：《中国人的社会生活》，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第 13 页。

④ 美以美会也称循道会，主张遵循圣经教诲，过着循规蹈矩的生活。